■ 红色记忆

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票和鲁西票逐步在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地区流通。从1941年农历十一月至1944年，冀南票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共200个县市4000万人口使用。

冀南票：运用货币武器坚持抗战

□ 牛贵葆 马世祥 闫洪涛

聊城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有一条独具特色的红色胡同。这条胡同于2012年10月17日修复落成，随着去年这处红色旧址提档升级，中共冀南区党委旧址、开国上将宋任穷旧居、冀南区高干会议旧址等一处处青砖灰瓦院落，更显得古朴庄重。

在占地30亩、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的红色旧址主展厅，展柜内摆放着两张珍贵的抗战货币冀南票，它是当年冀南银行在杨庄村印制的货币，再现了抗战岁月的冀南银行（也称“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写照。

跟随宋任穷秘密迁往杨庄

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之一。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一间农家四合院挂牌成立。高捷成出任首任行长。

1941农历十一月，经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刘伯承、邓小平批准：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政公署主任、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带领冀南党政军部分后方机关从河北陆续转移至杨庄村。宋任穷和夫人钟月林住在村民夏少增家中。冀南银行开始在河北大名县金滩镇西部的一个小村子，后来转移至朝北抗日根据地王奉镇邢町村。宋任穷进驻杨庄后，冀南银行也随同一起转移至杨庄，住在抗日堡垒户、村党支部书记夏炳银家中。为了保密，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对外称7号，冀南银行副行长熊光炳对外称8号。

冀南银行艰苦的抗战岁月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在杨庄村艰苦生活的场景。夏炳银家有三间堂屋和三间西厢房。冀南银行共有七八名员工，吃、住、工作都在这三间西厢房，睡通铺，用几块砖支锅做饭，喝稀粥。杨庄东部有夏炳银家七八十亩荒地，庄稼长不成，只能种一些谷子、绿豆、红小豆、南瓜等一些杂粮。夏炳银家属姓郭，村妇救会主任，1941年入党，她经常把自己辛苦种的一些杂粮无私地捐献出来，用于银行员工调剂和改善生活。进驻杨庄几年间，银行员工一次没出过家门，左邻右舍都不知道此处有银行。

冀南币站稳金融市场

1943年7月，经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刘伯承、邓小平批准：莘县、朝北县合并为莘朝县，原冀鲁豫三分区所辖堂邑、莘县、清平、冠县、朝北、卫东六县划归冀南区领导，成立冀南第七军分区。同时，建立冀南第七地委，赵健民为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第三军分区第22团调归第七军分区作为主力团。冀南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处，全区有几百万人口。当时，杨庄村隶属朝北第五区。在杨庄，宋任穷高度重视财政经济工作，把它作为抗日根据地生存、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最突出一点就是运用货币武器坚持抗战。坚持敌后抗战，是极复杂、极艰苦的斗争，经济战线上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军事战线。在敌占区，敌人实行经济掠夺，大量发行伪钞，吸取战争物资。宋任穷在杨庄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发行冀南票和鲁西票。”在冀南票发行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五花八门，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对此，冀南区专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宋任穷亲自担任主任，并以冀南行政公署名义颁布《禁止敌伪钞暂行办法的通令》。宋任穷在杨庄指挥了整个冀南区货币整顿活动，让冀南币占领市场，沉重打击了伪钞，肃清了土杂钞，在整个冀南区逐步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历经艰苦斗争，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

为抗战积蓄雄厚财力

在杨庄期间，冀南银行印刷发行统一货币冀南票和鲁西票，最缺的就是坚固耐磨的特殊纸张。怎么办？宋任穷就发动群众想办法，并找当地有造纸经验的工人和群众作调查。

夏炳银献计说：“有一次我外出打拳卖艺，正好碰见一个茶叶店老板用一种皮纸包装茶叶，我就问他这种皮纸是用啥原材料制成的，他随口说是用老树皮做的原料。我们何不到附近采集老树皮用它造纸币呢？”当时，杨庄村有500口人，3000多亩土地，绝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老树林。老树林中有松树、柏树、杨树等各种树木，大的一搂多粗，树龄至少在百年以上。后来的事实表明，用它造纸、印刷冀南币再好不过了。另外，还缺少油墨。宋任穷就多次召开民主会，群策群力想办法，并找十几位年迈的老人座谈，其中有一位教书的夏老先生说，可以用土方造油墨，就是将松膏烧成烟油，在调上熟桐油就可以了。于是，宋任穷就带领银行员工和一些干部战士，到杨庄树林中砍松木，取松膏，试制油墨，反复几十次，终于试制成功。

由于在杨庄统一了货币，宋任穷在对敌伪贸易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搞活了金融市场，不断积蓄和壮大了抗战力量。截止到1943年初，冀南军区的部队由最初东进时的五个连，发展到拥有七个旅6万多人的正规部队，另有六个军分区和各个县大队、区小队、村民兵组织，总人数不下十几万之众。部队人数多了，但装备简陋且又严重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宋任穷在杨庄，多次召开了冀南区党委会议，同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领导多次研究，决定用冀南票(纸币)兑换群众手中的铜钱。由于宣传工作到位，广大群众为了支援抗战，踊跃捐献或到银行兑换家中的铜钱。仅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冀南银行就从群众手中兑换了大量铜钱，20多个大瓷缸被装得满满的。平时埋在地下，随用随取。杨庄冀南军区兵工厂副厂长杨其延和兵工技师盖克，用银行兑换的这些铜钱，翻新和制造了二十多万发子弹，较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杨庄冀南银行由于生产车间少，冀南币产量不高，为了扩大发行冀南票和鲁西票，宋任穷在朝北一带开办了北王奉等多处印刷所，使冀南币逐步在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地区流通。从1941年农历十一月至1944年，冀南票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共200个县市4000万人口使用。

随着抗战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冀南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1943年初，宋任穷在杨庄率领冀南银行员工开始向朝北一带广大群众发放春耕贷款，解决农民生产中的一些困难，如动员群众用春耕贷款买牲口，组织边沿地区的骡马大会，引进敌占区的牲口，以解决畜力缺乏的困难。同年7月，宋任穷在杨庄组织指挥了冀南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冀南银行在大生产运动中开展信贷工作，以帮助生产为重点，辅助刺激农业之发展。同时，配合救灾发展手工业和农村副业，由朝北、莘朝县政府贷款所购置的大小农具不下一万种。冀南银行农贷利息实行低利政策，1942年，宋任穷曾多次组织冀南银行发放救济灾荒无息贷款。实施信贷工作在对敌贸易斗争、生产、救灾物资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开支，稳定了物价，保持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宋任穷在杨庄三年，冀南银行共发放农、工、商业贷款5.8亿多元。贷款对象绝大多数是贫农，其次是中农。

冀南抗日根据地货币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占领市场，给冀南抗日战争积蓄了雄厚的财力，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杨庄，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宋任穷依靠杰出的胆略、非凡的智慧，和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在“货币战场”上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金融奇迹，在我国红色金融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冀南银行印制发行的货币

■ 沧桑齐鲁

1928年5月3日大约9点半，胶济铁路主管人员已陆续到齐，赵幼梅同钱宗渊即对到站人员讲话。约20分钟，突然传来枪炮声。10点前后，枪炮声越来越凶，赵幼梅停止讲话，大家一齐躲避到地下室。没想到这一困就是十多天。

胶济铁路接收要员“五三”历险

□ 于建勇

1928年4月7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徐州，二次北伐，剑指北京。

5月1日，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方振武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

日本政府以保护日侨为由，出兵山东。5月2日中午，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600名日军抵达济南。

南京准备接管胶济铁路

5月2日晚上，南京政府接管胶济铁路的人员也陆续赶到济南。

南京国民政府在二次北伐伊始，就成立了战地政务委员会，以蒋作宾为主席，下设政务、外交、交通等处。交通处长由交通部路政司长赵幼梅兼任。交通处下设总务科、路政科、电政科、邮政科和航政科。路政科科长是钱宗渊，他曾任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副处长，1927年因为湖岛撞车事故被撤职。

时在津浦铁路车务第一总段任客货稽查、驻徐州站的谢岳也参加了交通处的工作。他在回忆录《接管胶济路前前后后》中记述了这段经过。

路政司随来的科员有何惠和肖卫国。何惠是胶济铁路沧口车站原站长，肖卫国是青岛车站货物主任。赵幼梅是谢岳在交通大学的老师，钱宗渊是谢岳胶济铁路的老长官，何惠和肖卫国是交通大学的前后同学和胶济铁路的老同事。4月23日随军出发以前，他们每人在徐州赶制灰色布军服一套和皮带一根。这是谢岳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军服。

由于交通部内定赵幼梅接任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一职，出发前，交通处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决定分三路进入济南：派肖卫国随方振武军由东路入济南。赵幼梅派肖卫国为车务处长，如果东路军先到济南，即以车务处长代理局长，先行接管胶济铁路管理局。如果中路军先到济南，赵幼梅自行接管路局。

谢岳与何惠乘火车于5月2日晚到达济南，住在津浦铁路宾馆。

津浦铁路宾馆位于今纬一路北端、馆驿街西端，是一座1908年建的德式建筑，初为津浦铁路北段总局驻济办事机构，1922年津浦铁路通车第10年，随着办事机构撤销，改为“津浦铁路宾馆”。

与谢岳、何惠同住津浦铁路宾馆的，还有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刚刚受命来济赴任的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副主任何思源，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主任罗家伦。

当晚，谢岳同何惠奉命到胶济铁路济南站查看情况。

当时济南商埠有两座火车站，一座是胶济铁路济南站，位于今经一路、纬三路交叉口北侧，今胶济铁路博物馆；一座是津浦铁路济南站，位于今济南站旧址，1992年被拆除。旅客坐哪条线的火车，在哪座车站上车。两座车站分别隶属胶济铁路管理局、津浦铁路管理局。

在胶济铁路济南站，谢岳、何惠遇到了5月1日中午到达的肖卫国。得知肖已于5月1日下午召集车务、机务、工务和警务各段、站主管人员先行谈话，以车务处长暂代局长先接管了铁路局。并查悉，日本早派有军事运输官一人驻站办理军车调度事宜。这在谢岳心头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中国的铁路，日本军人怎能驻站办事呢？这是侵犯主权的。”

谢岳马上同何惠回到津浦铁路宾馆，向赵幼梅报告。赵幼梅告诉他们，明日早9时，他前来接任，到时自有安排。

随后，谢岳和何惠回到胶济饭店。胶济铁路济南站建筑分两部分，东部是候车室，西部是饭店。尽管夜色安宁，却暗含杀机。

接收要员被困车站

5月3日早8点多钟，钱宗渊陪同赵幼梅来到胶济铁路济南站。

在未接任以前，赵幼梅已约日本军事运输官谈话，说明接任铁路的事情。此后谢岳他们通知车务段段长赵德贤，电约各段的主管人员和在站人员先行到候车室内集合，听候赵幼梅训话。

大约在9点半，人员都已陆续到齐，赵幼梅同钱宗渊即对到站人员讲话。

约20分钟，突然传来枪炮声。初时，讲者尚能镇静地讲，听者尚能安心地听。可10点前后，枪炮声越来越凶，人心不能安定了。赵幼梅停止讲话，大家一齐躲避到地下室。车站地下室面积与地面建筑所占面积同等大小，至今犹存。

据当时也在胶济铁路饭店的谢岳回忆说：“日本军事运输官也十分惊慌。此次枪炮声来自何处，系何军发射，都摸不着底。陪同赵司长的来人中，有个通晓日语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向那日本军官说：‘革命军决不伤害非武装人员，不要误会。’并拉他同我站在一起，他这才平静下来。”

这天，被日军杀害者达千人以上，房屋焚毁无数。此为日军制造的“五三”惨案。

谢岳回忆：“5月4日早晨仍有枪声传来，中午虽暂停止，晚上又闻有炮声，我们总在惊慌之中。这晚八九点钟，由津浦铁路宾馆里逃出来的人说：日本军队把蔡公时处长的耳鼻割下杀死了，交涉署十多个人也同时被害了。黄郛驻津浦铁路宾馆的卫队被解除了武装，黄郛也被赶到楼下去了，生死还不知道呢！我们听了心神不定，为我国外交人员的惨死而感到悲痛。”

在谢岳印象中，5月5日，“早晨八九点钟又闻枪声，时断时续，至下午才停止。”

六七点钟，谢岳同何惠天真地认为平安无事了，想到津浦铁路宾馆去看自己的衣物，就一同向津浦铁路宾馆走去。不料一出车站，迎面而来的是横架在马路上的木栅栏、铁丝网，马路两旁血肉模糊的死尸。马上退回胶济饭店，再也不敢出去了。

深夜12点多，此刻已经是5月6日了。胶济铁路车务段长赵德贤约谢岳到三楼一间房里，拿出一件工人穿的蓝布长衫和一条裤子，对谢岳说：“你把军衣换下来，穿上这套长衫和裤子吧！”

谢岳当时认为，穿军服有什么可怕呢？正在犹豫中，赵德贤说：“你换下吧，你我同事两年多了，无论如何，今晚你要脱下军服。”

谢岳难以拒绝，遂答应了。其他人也都把军服换掉了。赵德贤虽没说更换衣服的理由，但谢岳是铁路行车人员，知道军用列车不论如何机密，在铁路行车电报中是有特殊暗号的。谢岳想：必定有日本军车从青岛开来济南。

这一夜，大家都睡不着。

5月6日早晨7点多钟，从青岛开来的一列日军兵车上，突然走出四五名日本军官，手执小手枪，依次向谢岳等人逼问：“是不是南军？”气势汹汹，纠缠约20分钟，谢岳等人无法解脱。

一位铁路人员马上找到之前那位日本军事运输官，请他向那些日本军官说明谢岳等人的身份，那位运输官用日语说了几句，那些军官便向他敬个军礼，走下楼去了。

后来据熟悉日语的人说，这位运输军官是少佐，那些日本军官是尉官，运输军官对那些日本官兵说：“他们是铁路人员，不要麻烦，下去吧！”谢岳庆幸：“如果没有老长官赵德贤的照顾，那么我的性命，也同‘五三’惨案的死难者一样，早就不存在了！”

谢岳等人被困胶济铁路饭店。此后他看到，每天都有日军兵车由青岛开来，武器、军需品等，都是日本兵亲自卸车抬走，并不要中国工人替他们搬运，可见戒备森严。

住在胶济饭店的人很多，而食物却没有外源补充，供应一天一天地减少。原来每餐可吃到面包、鸡蛋、牛油，后来只有炒饭，到最后只有豆子充饥了。

谢岳记得：“从5月7日到5月10日，每天早晨都听到机枪声、大炮声。被困在胶济饭店里人人自危，心神不宁。”

福田通牒步步紧逼

5月6日这天早晨，一骑绝尘从济南南门冲出，直奔三十里之外的党家庄。他们是蒋介石、黄郛、朱培德、杨杰、熊式辉一行。

奇怪的是，一向军容严整的蒋介石，这次连军服都没穿。

随后，北伐军总司令部也转移到党家庄车站。冯玉祥应蒋介石之邀，从河南开封前线赶到这里与蒋介石会谈。会谈结果：蒋决定将北伐军事交冯主持，自己回南京主持党务。

5月8日黄昏，蒋介石乘专列到达泰安，一行在斗母宫用餐。不料饭未吃完，山下紧急的递步哨飞奔上来，送达一份福田彦助的急件：

——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刑。

——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

——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

——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

——为监视上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

盼上列事项，于12小时以内答复。

5月9日，蒋介石让罗家伦、熊式辉代表自己，进城与福田彦助交涉。

在济南日军司令部，熊式辉、罗家伦见到了福田彦助。福田彦助坚持将陈调元、方振武、王均部队缴械。二人拒不接受，为回去复命，让福田彦助提供了一份书面答复，以便留下证据。

胶济铁路罢工未果

5月10日，济南城内的革命军撤退，日军入城屠杀医院全部伤兵，平民死伤1.1万多人。(《日军侵华大事记》)

5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团山东省委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炮轰济南告胶济路全体工友书》：

……

第一、立即用总罢工的手段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事运输。

第二、在你们的司令部(胶济铁路总工会)的指挥之下，以全路六千多工人的力量作后盾，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下列几条：

1、日兵立即停止炮击。

2、限一星期内日兵全体退出山东。

3、由日政府赔偿一切损失。

4、取消日人在胶济铁路既得的权力，胶济铁路完全归胶济铁路总工会管理。

……

同一天，胶济铁路总工会发出了《为反抗日兵炮轰济南告全路工友书》：

……总工会为了恢复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光荣史计，为担负领导反帝国主义的责任计，为使山东四千万民众不当亡国奴计，特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下列六条：

1、立即停止枪炮射击；

2、一星期内日兵全体退出山东；

3、赔偿济南所受一切损失；

4、严惩主张炮轰济南的日兵长官；

5、立即恢复济南一切交通；

6、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一切特权。

以上六条，限日本帝国主义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以全路总罢工的手段对付。望我全路工友努力奋斗。

据《山东党史资料》1987年第二期(总第29期)记载：“为阻滞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胶济铁路向济南运兵，中共山东省委曾派宋琦到坊子车站组织铁路工人进行罢工。虽因日军自行开车，罢工没有实行，但事情为国民党反动派侦知，结果宋琦等同志被捕。”(《杨一辰传略》)

据《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记载：同年6月，四方机厂曾预备暴动，而慑于日本兵监视，未敢贸然行动。张店亦举行破坏工作——炸桥，预炸日兵赴济之车，但因技术不谙，未生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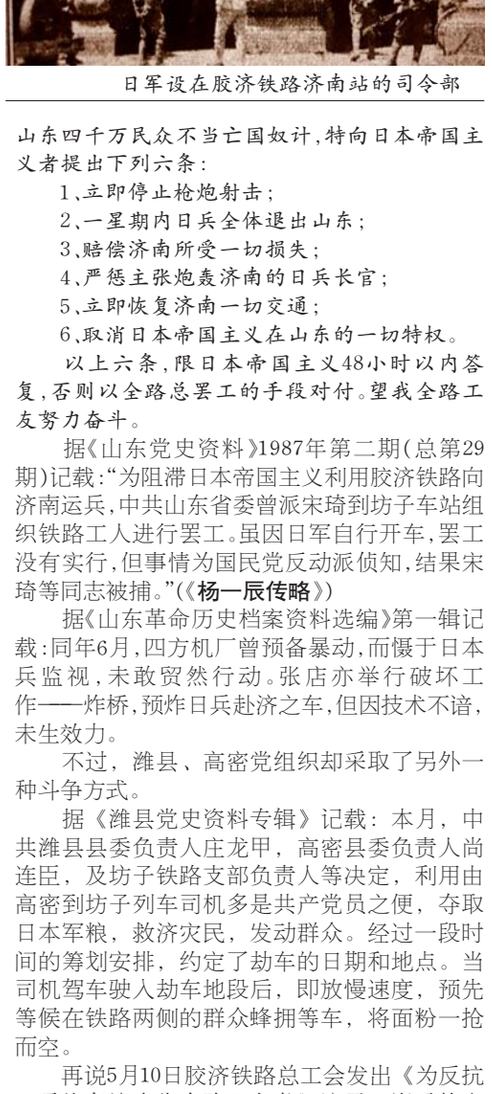
不过，潍县、高密党组织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方式。

据《潍县党史资料专辑》记载：本月，中共潍县县委负责人庄龙甲，高密县委负责人尚连臣，及坊子铁路支部负责人等决定，利用由高密到坊子列车司机多是共产党员之便，夺取日本军粮，救济灾民，发动群众。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安排，约定了劫车的日期和地点。当司机驾车驶入劫车地段后，即放慢速度，预先等候在铁路两侧的群众蜂拥等车，将面粉一抢而空。

再说5月10日胶济铁路总工会发出《为反抗日兵炮轰济南告全路工友书》这天，谢岳等人依然被困济南。谢岳依稀记得：“大约在5月15日前后，才得到消息，说我们可以退出济南。一天上午，一位日本军官把我们已被围困半月的10多个人，送出日本军事封锁线。我们走到党家庄，登上铁棚车，于是日晚离开了济南。”

至此，胶济铁路接收要员终于脱险。

胶济铁路济南站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日军设在胶济铁路济南站的司令部

1928年5月，初到济南的日军在站台上集合